

位育视角下城市家庭关系的冲突与弥合

易彬彬，叶南客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当前,我国城市家庭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甚至向后现代过渡的漩涡中,这对家庭结构、家庭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基于位育论,通过对城市家庭关系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化解冲突,即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位育之道:个体—家庭层面上,家庭成员提高修养,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契合;社区层面上,建立社区文化维系机制,加强家庭和谐文化建设;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上为家庭提供价值引领和制度支撑。

关键词:位育;家庭关系;转型;和谐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0)04-0077-07

伴随家庭结构与家庭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当代家庭形态趋向核心化,家庭关系主轴逐渐从代际纵轴转向夫妻横轴,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相应发生位置与次序的变化。虽然我国在法律和政策制度上解决了男女平等、老人赡养的责任与义务等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互动中的冲突不能完全用法律政策来协调化解,家庭现代化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为此,中国问题需要构建中国的理论和运用中国的思维来解释。化解现代城市家庭关系中个体与家庭整体之间的冲突,亟需厘清中国现阶段家庭关系冲突的主要类型及文化内涵,引入中国本土思维的治理机制。

一、现代化背景下的位育思想的适用性

从现代化背景下来看中国家庭变迁,并不能就

家庭问题论家庭,而应该看到其背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体逻辑。“千百年来,孔子的思想被用于型塑社会心态,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强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心态中较为稳定的核心影响力,延续两千多年。”^[1]近百年来,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人们变动的、阶段性的心态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代际之间的“孝于亲”、夫妻之间“男主女从”、兄弟姊妹之间的“悌于长”与现代人的平等意识及个体主义意识发生着严重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甚至造成了部分家庭的解体。与此同时,后单位制时代的城市家庭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下中国城市社会中绝大多数父母依然无私地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劳力支持,家庭网络依然是个体资源的重要来源,代际、兄弟姊妹、夫妻

收稿日期:2020-06-22

作者简介:易彬彬(1978—),女,湖南湘乡人,副编审,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研究。

之间的传统人伦关系仍广泛地存在现实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家庭价值观的持续和改变上,家庭价值观在两性婚姻上受“个人取向”影响较大,但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上仍很大程度保留了“集体取向”^[2]。唐灿等基于我国5个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调查发现,城市居民亲属关系的变化和发展逻辑与现代性因素之间并非简单线性或相互排斥的关系,亲属间互助互惠等工具性行为对人们的现代性没有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影响^[3]。阎云翔开创性地运用个体化分析农村家庭的私人生活,认为当代家庭的现代性一方面在于个体欲望、情感和能动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绵延不绝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4]。最近,阎云翔修正了自己早期的观点,他通过案例分析看到子代需要依赖亲代的支持,新家庭主义描述了个体向家庭纽带与意义等的回归^[5]。沈奕斐认为,中国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以多元和流动的家庭结构,经济和情感并重的家庭生活,亲子主轴倒置的家庭内部关系,年轻女性从老人处获取权力的家庭权力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个体家庭产生^[6]。钟晓慧等通过城市家庭合作购房实践分析两代人在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两者之间的协商与平衡,提出了协商式亲密关系^[7]。

从已有的研究和讨论来看,父母权威的回归、无限捆绑的代际关系、严母慈祖、协商式亲密关系等都表征,虽然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家庭结构与西方社会越来越接近,但如果家庭内部关系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推进,一旦极端个体化与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传统礼俗完全断裂,家庭内部关系会逐渐失去规范。西方经典的个体主义个体与社会关系“脱嵌”以普遍的福利制度和民族政治为背景,内在预设权利与责任的规范,而中国人的思想与社会共同基础是伦,在关系网络和道德品性上,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以一种抽象的形式渗透进中国社会结构之中,成为社会良序的共同意识与社会心理机制。

追溯中国家庭关系的现代化方向的讨论,从20世纪初发端,之后一直与中西文化之争及传统与现代之争联结在一起^[8]。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潘光旦,发表了《中国之家庭问题》等一系列著作及文章,潘光旦把大家族留其根干,去其枝叶,将家的范围限定在“直系家庭”的范围内,称为“折中家

制”。从两性关系、家内关系、家庭制度再到家庭与民族的重建脉络,他都试图在已有的现实基础上,通过补充、协调的方式,努力维持此阶段内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与综合,这样才能为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与发展潜能,培养日臻完善的人^[9]。他批判传统大家族“兼并了个人,篡夺了社会”,提倡折中家制;在强调女性生物本性的基础上,倡导妇女作为人的权利;在老人的赡养上,他关切到小家庭制里没有老人的地位^[10]。潘先生的家庭研究从爱与恋讨论到婚姻选择的社会效果,从家庭内各个成员的地位、关系讨论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从家族制度的改良扩展到民族的绵延与发展,内容非常丰富繁杂,其中贯穿着一条他试图统摄自然性与伦理性的社会思想原则,这种社会思想原则和历来注重制度与结构分析的社会学迥异其趣,特别有助于思考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社会学界皆知潘先生是一位矢志不渝的优生学家,其实,潘先生不过以优生学作为他追求‘提高民族素质’‘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的基础,在更深一层的思想气质中,他实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一个以‘不同而和’的思想路线,构筑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11]潘光旦作为一位新人文思想家,他在个体与社会之间构建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两端是个体和社会,个体有通性、个性、性别,群体要保持秩序、文化发展、种族绵延。如何促进个体的适宜发展与群体的繁荣昌盛,如何维护个体和群体的和谐,潘光旦先生通过“位育”概念将“人的培育”与社会的“伦”连接起来。

在潘光旦的思想体系中,“位育”是一种促进事物稳定与发展的整全的方法论视角,其将中国儒家典籍《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应于西方的生物进化论中的adaptation或adjustment。他认为,“位育”比适应更能表达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适应强调环境的作用,而“位育”则看到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适应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看作一方的片面顺应,而位育则考虑了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感应与影响,双方互为因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诚如潘光旦先生所言“惟有经由中和的过程,才能达到位育的归宿”。位育

是整体的、系统的体系。“中”是“中正”“适度”，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和”是事物在一定阶段的稳定，是矛盾双方相互协调达成的一种和谐。儒家“中和位育”思想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视角，“位育”的视角是一个万物共生的视角。“中和位育”是指通过不偏不倚的原则，维持整体和谐，让人人在自己的位置获得充分发展，中和位育立足点在每个个体身上，以人为本，使人人尽得发育、发展之宜；在社会层面上，位育让人与人不因相异而相左，而是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则讲求人天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中和位育思想，注重个体的内心与外在在文化环境、物质环境的协调、平衡；主张民族与世界文化的安所遂生，既要接受先进文化，取得进步，也不要忘记本民族和固有环境的连续性和联带性。总体而言，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经历了一个对于儒家社会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的比较分析，然后综合融汇而成的过程。但是，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不被当时的革命激进主义所容，但放到当下，或许能更理解其合理性^[12]。

当下，代际之间亲权子责、固定模式及角色取向的孝道观念愈来愈向亲权子责并存、权变模式和情感取向转变^[13]。家庭生活不同于公共政治，因爱而缔结的家庭，亲密与爱是家庭关系的起点和终点，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终极意义。如何以每个家庭成员为基点，形成一种灵活的、弹性的可以拉扯的关系，如何维护与实现每个个体的幸福与利益又实现整体的和睦与喜乐，是城市家庭关系的重中之重。位育的概念把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沟通起来，同时又可与西方的角色、受规约的行动概念勾连起来^[14]。中国人过日子的生活逻辑，不是在纯粹抽象的认识论上谈问题，而是在实践意义层次上讲的一种方法，潘光旦的位育思想提供了这样的方法，以个体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个体的德行、智力、才能为基础，为个体找到适宜的位置与发展，个体的发展不是与家庭其他成员对立博弈，而是家庭成员在合适的位置发挥个体特性、发展个体潜能。笔者对城市家庭关系的冲突与弥合进行研究，关注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冲突以及文化内涵，剖析家庭关系中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关联与张力，以个人—社会的协调运行来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关系的位育之道。

二、城市现代家庭关系冲突的主要类型及文化意涵

2017年笔者随妇联对N市社区家庭文化建设进行调查，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座谈、走访社区内的活动中心及进入部分家庭进行访谈，了解到社区社工调解的家庭矛盾起因纷繁复杂，主要的冲突在于家庭不同成员的伦理价值观不同步，家庭内部代际、夫妻、兄弟姊妹之间的矛盾背后的文化内涵，大体可分成以下3种类型：

1. 代际之间的冲突：礼与理

在城市家庭中，70后、80后独生子女比率高，为方便子女照顾日渐年老的父母，同时父母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子女与父母家庭合并为新三代家庭，同吃同住或同吃不同住。笔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访谈TC花园社区居民，TC花园社区内大多数居民认为孝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老人谈到子女尽孝，要求也不高，就希望子女能“不给父母添负担”“用自己的成绩报效父母”“常回家看看”等。在新三代家庭里，代际关系冲突主要发生在婆媳、翁媳、翁婿之间。TC花园社区工作人员讲了一个“同在一个屋檐下”婆媳矛盾的故事：因为照料孩子上的分歧，婆媳之间发生了口角。媳妇非常委屈，认为公公婆婆不讲“理”。公婆却认为媳妇不懂“礼”，他们老两口帮忙义务带孙子、帮衬买房子，媳妇却不懂得感恩。案例的冲突根源在于公公婆婆站在纵轴优先的角度以权威的身份管理家庭事务，而媳妇站在横轴优先的角度认为公婆只能以协作者身份参与家庭事务。在公婆一端，他们帮忙带孙子、把养老的资金拿出来赞助买房子，图的是整个家庭情感上的亲密、和美，老人牺牲个体利益换取家庭整体利益，他们遵循的原则不是西方的交换理论，而是东方的“伦”，“伦”是具有中国社会特征的议题。老人希望儿子媳妇从言语到日常行为上尊敬老人，老人对子女赡养的要求降低，但亲情沟通的需求——对子代“礼”的要求没有降低。在媳妇一端，她希望老人学习科学育儿、尊重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亲代与子代平起平坐。亲代的“礼”与子代“理”不在一个维度，子代的诉求是无条件享受亲代的馈赠与帮助，不更张现代生活理念中基本的“正当权力”，亲代的诉求是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在实践中子代与亲代“礼与理”的冲突，难以用西方社会契约中的自由、平等来界定。

2. 夫妻之间的冲突:主与次

在城市家庭中,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比较大,在城市普通双薪家庭中,家务劳动和亲职劳动多数由女性承担。笔者对 TC 花园社区内的女性进行滚雪球访谈,大多数女性感觉家务分工、亲职分工中两性等级性差异依然分明,所有女性都感觉“女主内”对女性是不公平的,因此会采用晚结婚或减少生育、回避生育的策略来抵抗。很多职场女性反映,夫妻双方都上班,妻子收入与丈夫收入持平或略低,有的甚至更高,但在孩子养育、老人照顾上多数还是由妻子负责。由于女性需要照顾家庭,工作一家庭发生冲突,升职加薪机会减少。如 M 是学校骨干教师,老公是 4S 店总经理,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主要原因在于照顾孩子及老人由谁主要负责。M 的老公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无暇顾及家务,M 只能放弃自己的晋升机会照顾家庭。虽然相关法律条例中规定了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业等权利,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女性被区别对待,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和职场上女性遭遇“天花板”现象屡见不鲜,市场呈现给女性劳动力的整体上是一种不友好的界面。为了谋求家庭平衡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女性回归传统、回归家庭潮中,“主妇化”“母职经纪人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体现男性优势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规范并未有根本改变,个体的选择难以突破结构的规训。

3. 兄弟姐妹间的冲突:义与利

多子女家庭中,房产的分割和继承、父母亲的赡养与照料往往是家庭冲突的焦点。按照法律规定兄弟姐妹继承权平等,但在现实中,女性的继承权往往不被平等对待,涉及女性继承家产时容易产生一些纠纷,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多子女家庭在老人赡养问题上冲突也较多。如,TC 花园社区内的 A 家庭有一儿一女,父亲过世后留下母亲一个人,其中儿子家境不太好,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搬过来和母亲一起住,照顾母亲。但搬来后不久,社区就接到女儿投诉,说哥哥不让她进门探望母亲。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调查发现,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子的归属。分析此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出嫁女儿的财产继承权虽然受法律保护,但在现实生活中仍不能被完全平等对待。剖析家庭财产、老年人劳动力分割及老人的赡养纠纷,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怯于提的“利”被无限地放大了,兄弟姐妹之间亲情被“利”撕裂。市场

经济所渗透的经济理性对家庭成员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家庭成员情感关系呈现出工具理性化的趋势,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强调理性算计等。市场化使人强调个人权利、欲望和自由,形成一种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导致撕破脸面。

纵观矛盾起因,代际之间“礼与理”,夫妻之间“主与次”,兄妹之间的“义与利”折射当前社会转型的深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个体化与家本位之间的张力,传统的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受到冲击,结为一体的个体在家庭生活中自我的话语权凸显出来,在个体化的视角下,传统的家庭关系开始瓦解,家庭由一种“需要的共同体”正在变成一种“选择性关系”、变成一种“个体的联合”。家庭内部的个体之间需要协商和平衡,亲属关系也不再是命定的,而是需要个人竭尽全力去维持和照料它^[15]。家庭内部传统的固定角色关系逐渐被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性互惠,价值、态度、追求一致,相互支持与协作所取代,代际、夫妻、兄弟姊妹之间关系更多根植于情感基础与互动频率,而非角色权威,家庭权力关系呈现流动、变化的状态。在转型社会,关系无法回避的结构力量或关系中隐含的应然层面的“伦理”都在悄然变化,弥合家庭关系的冲突,关键在于把握动态中的平衡。主干家庭的代际关系和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及准联合家庭的兄妹关系与多样化的家庭结构、多元化的家庭文化息息相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微妙在外在的结构和内隐的“伦理”影响的心态,即人的精神世界之间的连通,互相权宜,互构因果。

三、位育:动态平衡的治理机制

把主干家庭的代际关系、核心家庭夫妻关系、准联合家庭的兄妹关系的冲突放入位育思想来看,家庭问题就是一个家庭成员的位育问题,家庭内部每个人的位置受个体的通性、性别和个性等变量影响。个体的“位”内在隐含了个性之异、性别之异,“育”即发展、进步,进步的根据就是个体之间的“异”。潘光旦先生认为,从社会秩序的维持上看,要遵从个体的“通性”角色规范;从社会进步的发展上看,要推崇个体个性的发展,这就涉及一个方法的平衡,两纲六目的协调运行就是位育。位育论作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是从整体上解决与看待问题,这种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二元论的博弈,而是东方的思维,是一种讲究分寸律的动态的平衡,个体与社会达到动

态的平衡。

潘先生对此下了一番功夫,从两纲六目(图1)的运行来看,纲目形成动态平衡的网状框架。个人和社会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个性发展在兼顾通性之同、不破坏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促进社会进步。在个人—社会纲目动态平衡体系中,他吸纳儒家中庸分寸律来处理复杂的平衡系统中的协调问题,不偏于极端,亦不死守最中之点,持中有权。对事:守常待变;对物:推十合一,以一持万,以约持博,从同容异;对人:中而能恕。顾一兼多,经为一,权以应对为多。潘先生意识到,两纲六目是治标的方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再往深入一步,要围绕个体与群体的需要来架构思想理论。新的思想理论融汇5个头绪,分别是古人文思想、生物位育论、社会文化的功能学派、实验论与工具论、人的科学。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潘先生认为古人文思想的第一大特点在从人出发、以人为归宿,始终以人类生活经验为理论依据。人类之生而有异,故其在第二步,发生冲突时,一起折中于人,即由人来斟酌损益,讲求应有的分寸,使不致畸轻倚重,使人人各得发育之宜,在社会方面,则使人与人之间,不因差异而相害,而因差异而相成。潘先生还提到,折中不是折半,中的所在是活动的,是必须斟酌、有分寸的。在人与社会两纲内,根据人的通性、性别、个性的动态,社会秩序、种族绵延、文化进步也相应变动^[16]。这种中庸并不是含糊的,潘先生提出明伦行恕,他认为类别或差等的伦是具体而静的,要靠理智来辨认;关系的伦是抽象而动的,要靠情绪来体会与行为来表示。恕,是个人的自知裁节,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潘先生的位育论是在明辨个体的性别、年别、体力、智能(程度的和品性兴趣)等先天性差异之后尊重、认可这些差异,在此基础上协调六目之间的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加强品格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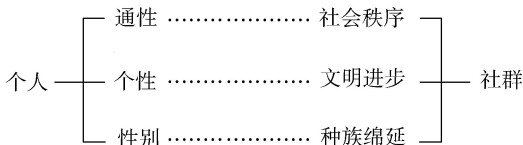


图1 两纲六目图^①

位育论对我国转型期间个体与社会的修齐治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有助于理顺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个体与自我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男女性别和个体阶层差异和区分上发生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了潘先生所处的时代认识,百年来,中国人与中国社会遭遇的心灵问题与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儒学和科技来解决,“真正的重建工作必然是将这些资源融会贯通之后的结晶,必然是以‘人’为核心的重建”^[17],人要被完整地了解和发展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在天人之际强调社会的“自然”基础,即“位”的重要性。在人伦之际强调“人化的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的核心都应该是“人”,强调了“育”的重要性。二者合二为一而为“位育”,表现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均衡与协调^[18]。“要个人生活与人格的健全发展,要通性、个性、性别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教育,在一种通达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要社群生活与群格或国格的健全发展,要秩序、进步、绵延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政治,在一种通达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19]潘先生试图构造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宏大的思想体系来统摄个人、社会的两纲六目的运行。把潘先生的位育思想切入当下家庭现实问题,从个体—家庭、社区、国家位育来建构和谐的现代都市家庭关系,弥合家庭冲突。

1. 个体—家庭位育

重视品格教育,城市家庭关系的建构要使家庭成员自我内心、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与社会、自然不冲突、和谐相处。“要个性之异推进群居生活之和,并且推进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一个明字,要行明行恕,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个人能自知裁节。”“品格教育是三部分合成的,一是通性与个性的辨识。二是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与确立。三是个人的修养。特别是要注意到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最困难、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善自裁节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20]在日常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发生冲突的情况在所难免,其需要注重自我品格修养提升:首先,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正确理

①1944年,潘光旦在《民主周刊》第1卷第4期发表《个人、社会与民治》一文,在文中,潘光旦把个体、社会看作两纲,两纲分别包罗了个体的通性之同、个性之异、男女之分和社群的社会秩序、文明进步、种族绵延六目。

解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角色,应该行使什么样的权利,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其次,每个家庭成员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反思自我,调整自己的角色来满足社会的发展对家庭秩序的要求。第三,家庭成员自我把握行为边界,其行为应该在家庭伦理道德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如果超过这个边界,容易激化家庭矛盾。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人内在的心态要适应社会整体环境,个体要从内而外地提升自我修养,反思自我的角色定位和责任,不能一味以自我为中心,让自我膨胀而从不换位思考家庭中其他成员。在家庭内部,夫妻做到互相尊重,父子婆媳互相包容,兄弟姊妹互相理解。个体不能漠视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心态要开明而包容,家庭整体的环境与社会大的文化环境相成而不相左,人人都拥有追求自我的权利,自我的发展不应妨碍其他人的发展,各得其所。

家庭成员之间达到契合,家庭关系不仅是共存秩序也是共荣秩序,夫代与子代,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互相依赖、相互融合,在家庭内部合作分工,均衡互惠,既不能一味只为自己而活,也不能完全放弃自我。在家庭内部分工中,首先承认个体性别、年龄的差异,根据人的自然属性同时兼顾个体的“德行、智力与才能的高下优劣”来安排个体的功能角色。

2. 社区位育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位育所依赖的环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体内环境,即个体内在的心态、心境;二是指体外环境,体外环境分成横亘空间的物质环境和纵贯时间的文化环境。人的心境与外在物质文化环境相和谐,就要求人们能够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中与不同的社会个体友好相处、共存共荣。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与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各自“安所遂生”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要求。人与外在环境中的事物和人的安所遂生,在传统社会依赖礼俗维系,城市社区则迫切需要建立具体有力的社区文化维系机制,让异质性的城市人群安其所、遂其生,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社区建设中扎根,“中和位育”显然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21]。

第一,在人口流动性、异质性背景下,城市社区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教育加强社区认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TC

花园社区开展家风、家训活动,开展家庭学法竞赛,开展民法典宣传教育活动;启动社区家长学校、云课堂,家庭阅读、文化诵读活动;通过社区网上妇儿之家、社区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公益活动和信息,占领网上阵地。

第二,城市社区人与人之间原子化,社区建设过程中通过提供居民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居民喜闻乐见的活动,让居民在公共文化生活情境中不断体验、认知礼与仁的现实意义,从内心认同家庭情感机制,进而建构家庭道德。如,TC花园社区“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号召大家拍全家福,社区居民积极响应,照片由居委会组织展示,居民参与评选。据社区主任介绍,被评选为特等奖的家庭祖辈地位显赫,中途经历诸多社会变革,但是家庭凝聚力一直不散,到了当代,一家四代同堂,父严子孝,母慈媳孝,内外结合,相得益彰,这种礼仪之家的示范效应明显。

第三,城市社区积极传播和谐平等的家庭观念,疏导传统认识误区,从现代社会分工、家庭伦理、主流文化背景等多角度宣传现代家庭合作分工的意识和技能。TC花园社区家庭文化建设活动中最受欢迎的两大项目是“周末亲子学堂”和“超级奶爸大擂台”,社区宣传亲职合作,让父亲分担家务,参与子女教育的实践活动,逐渐改变男性将自己固化在赚钱养家角色上的观念,很多奶爸们通过培训,在带孩子的技能上甚至超过妻子,他们也很欣喜地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平衡协调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家庭更加幸福美满。

3. 国家位育

加强国家立法、公共福利政策制定。当今,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双向互动既有利于保障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和谐与活力,也有利于维护个体的正当利益和发展空间。国家一方面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个体的价值体系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政策顶层设计者,在公共政策和福利制度的制定上,加大对个体提供普惠性的支持和服务的力度,从政策制度上为个体、家庭提供保障与兜底机制,切实地将家庭与个体的民生需求放在重中之重。应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加强共建体制安排、共治制度供给和共享机制支撑即国家宏观层面上的位育,构建多主体、多向、多元、多层次的协同治理,追求整个社会成员权利实现最大化。

四、结 语

潘光旦的位育思想与西方社会、政治思维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看到了社会事实的差异,企图在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上努力缩小这些先天或后天的差异,而非尊重差异、认可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思想体系,这是中西两种社会的文明特质。比较而言,儒家思想的构建更倾向顺应并强化和规范差异以此得到一种社会建制,而西学则想通过设立一套平等或正义的理念来改造社会^[22]。位育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路向,从中国人本土的行事方式和中国社会深层运行的逻辑来进行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政策亟待完善的体系来支持社会和个人发展,在当前社会公共性培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尚存不足的状态中,位育思想对家庭关系的现实指导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王俊秀. 型塑和践行:社会心态历史视角的初步考察[J]. 新视野,2017(6):93-97.
- [2] 金耀基. 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3] 唐灿,陈午晴. 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J]. 江苏社会科学,2012(2):92-103.
- [4]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陆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5]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 李放春,刘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6] 沈奕斐. 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 [7] 钟晓慧. 个体化理论下的中国家庭研究:转向与启示[J]. 中国研究,2020(1):5-23.
- [8] 吴小英. 思想谱系中的家庭及其左右分野——兼论家庭研究的本土化焦虑[J]. 河北学刊,2019,39(2):171-179.
- [9] 杭苏红. 性爱、家庭与民族:潘光旦新家制的内在理路[J]. 社会学研究,2018(1):194-216.
- [10] 潘光旦. 老人问题的症结[M]//吕文浩.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11] 韩明谟. 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纪念潘光旦先生[M]//潘乃穆. 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12] 吕文浩. 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潘光旦[M]//吕文浩.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13] 叶光辉. 台湾民众之孝道观念的变迁情形[M]//叶光辉,杨国枢. 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 [14] 苏国勋,熊春文.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院访谈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2):5-19.
- [15] 吴小英. 主妇化的兴衰——来自个体化视角的阐释[J]. 南京社会科学,2014(2):62-77.
- [16] 潘光旦. 派与汇[M]//吕文浩.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17] 杭苏红. 人的科学:潘光旦的科学观[J]. 学海,2018(5):59-66.
- [18] 周飞舟. 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J]. 社会学评论,2019,7(4):3-18.
- [19] 潘光旦. 个人、社会与民治[M]//吕文浩.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0] 潘光旦. 论品格教育[M]//潘光旦. 儒家的社会思想.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1] 焦若水. 人文区位与位育中和:中国社区理论的渊源与民族品格[J]. 学海,2014(4):33-38.
- [22] 翟学伟.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J]. 社会,2016,36(5):1-35.

(责任编辑:高虹)

